



九州出版社

徐国琦 著

为文明

出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

为文明出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

徐国琦 著

辽海出版社



© 五洲传播出版社版权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 / 徐国琦著. —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085-3605-7

I. ①为… II. ①徐… III.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史料 IV. ①D634.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9264号

监 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华工的故事

著 者 徐国琦

出 版 人 荆孝敏

责任编辑 高 磊

设计制作 北京原色印象文化艺术中心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31号生产力大楼B座6层

电 话 010-82005927 010-82007837

网 址 www.cicc.org.cn www.thatsbooks.com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0千

书 号 ISBN 978-7-5085-3605-7

定 价 188.00元

值此一战百年之际，
谨以此书作为心香一束，
遥祭家父徐金祥先生及一战华工在天之灵。



序 言

一段值得发掘的历史

徐国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撰写了《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一书。作者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4 万华工赴法工作的情况,介绍了他们在法国的生活以及华工对法国的贡献,并且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角度,探讨华工赴法造成的影响。徐先生的这项工作是值得赞许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一段不仅不应被忘却,而且很值得进一步发掘的历史。

1914 年 8 月 1 日,德国向俄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人觉得,欧洲人打仗,离自己很远,且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没有必要参加这个战争。因此,大战开始后,中国宣布中立。然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极为残酷、血腥的战争,打了两年之后,交战双方损失惨重,法国、英国劳动力严重匮乏。于是,他们就找了中国人,提出希望中国能派劳工赴欧洲。而在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积极推动政府派出劳工,希望借此参战并争取在战后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最终决定派劳工赴欧洲。14 万华工在法国从事最艰苦的劳动,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支援了战火中的法国。据不完全统计,他们中大约有 2 万人死在法国。

2002 年春天,我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与旅法的华人、华侨社团的领导人 and 法国官方的代表赴法国北部华工墓地扫墓,慰藉长眠在法国的华工。华人华侨扶老携幼,700 多人出席了这场活动,场面是很感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总理若斯潘分别为这次扫墓活动致函,深切悼念这批为法兰西捐躯的中国人。

我在扫墓之后在墓地里走了一圈。令人欣慰的是,墓地维护得很好,绿草茵茵,一排排整齐的白色大理石的墓碑,好像代表着故去的亡灵,在春日的阳光下接受来自祖国亲人的缅怀和悼念。许多墓碑上镌刻着死者的名字,和“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等豪言壮语。但同时我也看到许多墓碑上没有名字,只有阿拉伯数字的号码。我不禁一阵心酸,怎么名字都没有,只剩下号码了,号码使我想起了囚犯!我在扫墓后还会见了华工的后代,从他们长相上看,中国人的特征已经不多了。但他们在与我交谈中,都以自己有中国血统为荣,强调法国人不当忘记华工赴法参战的这一段历史。

十几万华工赴欧这段历史不应该被淡忘，因为这对于中国后来的走向有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读一读中国的现代史就会看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这79年当中，中国的主导思潮是向西方学习。中国这样一个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领先了上千年的国家，在鸦片战争后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人痛定思痛，认识到自己落后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方学习，赶上去。但是，中国的主导思潮后来发生了变化，转折点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1919年初，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慷慨陈词，要求收复山东半岛。因为战前山东半岛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现在德国被打败了，中国派劳工参加战争，属于战胜国，收复山东半岛理所当然。然而，1919年4月29日，美、英、法三巨头正式通知中国代表，决定山东半岛不归还中国，给日本。消息传来，中国人愤怒了，中国人感到上了当，受了骗，“老师欺负学生太过分了！”于是北京学生走上街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学西方的道路行不通了，从此，中国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国人走上这条道路是被逼出来的！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华工赴欧，没有巴黎和会中国人受辱拒签《凡尔赛和约》，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人的彻底觉醒。徐国琦先生将这段历史发掘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起来革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今天的中国。

华工赴欧这段历史不应该被淡忘，因为这是中法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在法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支持了法国。这种支持是真诚的，不计代价的，不索取回报的。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华工都回到了祖国，战争给他们心灵上所造成的创伤是严重的。我曾经见过华工的后代，他们对我讲，他们的父辈在若干年后，谈起在法国的经历时，对于战争的恐怖还久久不能忘怀。有少数华工留在了法国，2002年初我到法国西部滨海城市拉罗谢尔访问的时候，该市的市长向我介绍了该市最年长的市民——一位106岁的华工，名叫朱桂生。他在当地备受尊敬，娶了一位法国人为妻，妻子已经去世，是他的女儿陪他来见我的。朱桂生是江苏溧阳人，见了我很高兴，对我说：“年纪太大了，回不了国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无限的遗憾和悲伤。

华工对法国的贡献是中法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希拉克总统说：“任何人都会忘记

这些远道而来的、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国的领土、理念和自由。”1998年，法国政府在华人、华侨社团的强烈要求下，在巴黎13区中国城内竖起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写着：“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

华工赴欧的这段历史不应该被淡忘，因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部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走向世界大体上是两部分人。第一部分是留学生。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这是一批10—16岁的幼童。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些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士，诸如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的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嗣后，中国先后出现了派遣留学生留日、留法的热潮，以及20世纪40年代两次留美的热潮。这些可以算作中国人近代以来留学海外的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留苏、留东欧国家的浪潮。第三次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向国外大批派遣留学生。第三次浪潮的规模之大，派往国家之多，是前两次浪潮所无法比拟的。第三次留学浪潮现在还远没有结束，并将继续发展和向前推进。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留学浪潮对中国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第一次浪潮中涌现出大批推翻满清政府，推翻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力量；第二次浪潮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浪潮已经和正在为中国现代化培养着中坚力量。

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另一部分人则是劳工。中国劳工大批赴海外可能要从19世纪中叶华工赴美参加修建东起内布拉斯加、西迄加利福尼亚西海岸，横贯美洲大陆的大铁路算起。据美方统计，从1865年到1869年，大约有14000多名华工参加这条大铁路的建设。需要指出的是，全长1800英里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地势复杂，要通过海拔二三千米的山区，冬夏两季温差很大，冬天常有暴风雪袭击，这些最艰苦的路段是由华工完成的。此后，加拿大在19世纪末修建一条横贯东西、穿过落基山的铁路时也有大批的华工参加。此外，巴拿马铁路和运河的修建也有大批的华工参加，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就要算在一战期间，十几万华工赴欧。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究竟有多少华工走向世界，没有确切的统计，粗略地估算可能有几十万之多。他们这些人是作为苦力赴欧洲、美洲和拉丁美洲的。他们被人瞧不起，

受到种种歧视，但是他们往往是承担工程最艰苦的部分，干得很出色。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都说美国和加拿大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如果没有华工参加，工程不可能提前完成。劳工中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当地，成为早期的华侨。中国劳工走向世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但是外国人开始注意这一段历史。不久前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碰到秘鲁前外长，他就写了一本关于华工的书。他对我说：“我对当时我们的政府如此歧视和虐待华工感到耻辱。然而，尽管如此，华工在参加各项工作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勤劳、苦干和不畏艰险的品质却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工在当地留下来后一般都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留学生与华工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留学生一般属于社会精英阶层，而华工则属于社会底层。不管精英阶层也好，还是中国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也好，他们都是中国人，都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在走向世界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文化带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华人、华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们同国内保持着联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回过头来也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发展。

21世纪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大批外国人来到中国的世纪。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中国累计出国人数加在一起不过28万，然而，仅2006年一年，中国出国人数就高达3400多万，外国人到中国的有2200万。这么大规模的交流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可能还是第一次，再往前看，这种双向交流才刚刚开始。研究中国人过去是如何走向世界的，东西方文化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课题。更好地认识过去，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中华文化、认识中西文化交流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作用，必将对21世纪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大有帮助。徐国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的国际化，我衷心希望他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吴建民

2007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 吴建民

前 言	2
1. “大战争”和中国之大转变	13
2. 中国的对策：“以工代兵”	33
3. 征途漫漫	85
4. 西线战场陌生客	109
5. 血染的风采	155
6. 教学相长：作为“伟大一代”的华工与中国精英	187
7. 为文明出征：华工之贡献及历史地位	207
8. 一战华工的归宿及历史记忆	227
结 论	256
注 释	259
附录一：惠民公司招工合同	269
附录二：英国招工合同（仁记公司）	273
鸣 谢	275

目 录

序言 / 吴建民

前 言	2
1. “大战争”和中国之大转变	13
2. 中国的对策：“以工代兵”	33
3. 征途漫漫	85
4. 西线战场陌生客	109
5. 血染的风采	155
6. 教学相长：作为“伟大一代”的华工与中国精英	187
7. 为文明出征：华工之贡献及历史地位	207
8. 一战华工的归宿及历史记忆	227
结 论	256
注 释	259
附录一：惠民公司招工合同	269
附录二：英国招工合同（仁记公司）	273
鸣 谢	275

前言

我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一直对中国及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问题情有独钟，在世界各地阅读档案，历经数十载寒暑艰苦努力及思考后，终于茅塞顿开，学有所成。从 2005 年开始，相继推出一系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2005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人《中国与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 一书英文精装本(英文平装本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2011 年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将此书纳入其“人文经典文库”系列，出版中文版)；2011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拙著《西线战场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 2014 年以“一战中的华工”书名出版其中文版。2015 年夏，我受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邀，完成《亚洲与大战：一段共有的历史》(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书稿，如一切顺利，此书应能在 2016 年年底左右同英文读者见面。读者诸君手头的这本小书，就是在我近十余年出版的这几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英文学术专著基础上所写的普及版。因此，这本书虽小，却浓缩了我多年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本小书也是我在 2007 年由北京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华华工》基础上之增补和修订版，而且大部分章节为新作。本来，在花了 20 多年的时间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想应该跟战争告别，并将精力转移到我长期以来一直想系统研究的关于“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What is China and Chineseness) 的课题。但五洲传播出版社希望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100 周年之际将《文明的交融》加以修订并大幅增加我后来的研究心得。盛情难却，在几经挣扎和犹豫后，我终于同意。

我之所以愿意花宝贵的时间写这本书，还因为中国人甚至在一战百年之后的今天对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仍旧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理解。依个人浅见，一战和一战华工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一战及一战中的华工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篇章。我的《中国与大战》一书就是旨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角度来透视中国人如何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之漫长历程，并分析国际社会如何对中国主动参与国际程序的重建及中华民族自我更新作出反应。我在 2009 年接受《西湖》杂志长篇采访时甚至大声疾呼，“没有一战，何来五四？”¹ 在一战百年之际，中国人应该对一战有更清醒的客观认识。

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一战的历史。公元 1914 年是中国的虎年，也是中华民国三年。就在这一年，人类历史上所谓的“大战争”(the Great War) 爆发。在另一场世界大战于 20 多年后再次打响后，那场“大战争”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定义为“文明”之战。协约国在战后颁发给参战人士的胜利勋章(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 上就刻有“为人类文明之战, 1914—1919”字样。²一位西方学者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战场上或者经济上的得失, “对英国人来说, 这是一场守卫大英帝国秩序的战争”。而与英国类似, 德国人则认为这是“德意志民族的圣战”。因此, “对德国人来说, 这是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 对英国人来说, 这是一场维护世界秩序的战争。德国人为未来而战, 英国人为传统而战”。³著名的美国学者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在 1914 年 8 月 5 日写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或许会让“文明陷入血与黑暗的无底深渊”并“将打破有史以来我们对世界会变得更美好的幻想”。⁴一位美国官员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也写道: “当世界大战被真实地记录下来, 当胜利得到客观的评价之时, 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配享有文明胜利的桂冠。”⁵因此, 无论是战争刚开始, 或已结束, 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 这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 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血与火的残酷考验; 而且从相当大的意义上, 一战的重要性远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不仅因为二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 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 在一战 100 周年之际, 我们对这场所谓的“大战争”对中国的意义仍缺乏真正了解。人们仍在辩论其影响及后果。

实际上, 一场有关一战意义和影响的辩论在一战结束后即在东西方展开。德国学者斯本格勒 (Oswald Spengler) 宣称一战标志着西方的没落, 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中国人梁启超则在其于 1918 年底到欧洲游历及考察中所撰的《欧游心影录》中声称一战的结果显示东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优势。梁启超写道: “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 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甚至用其饱含深情的笔调告诫中国人: “我们可爱的青年啊! 立正! 开步走! 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 愁着物质文明破产, 哀哀欲绝地喊救命, 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 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 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⁶对梁启超而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将人类文明毁灭殆尽, 而西方一直标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难辞其咎。除梁启超外, 中国人梁漱溟、辜鸿铭等均属强调东方文明优越阵营的大将。当然, 当时鼓吹东方文明至上的中外人士大有人在, 以至美国哲学家杜威 (John Dewey) 在 1923 年为另一位哲学家、英国人罗素 (Bertrand Russell) 所撰《中国的问题》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提到, “在大战后, 中国似乎成为光明天使, 映照出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国之道德准绳成为蝎子之鞭, 抽打自以为是之西方人之背脊。”⁷应该指出的是, 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东西方文明间站队, 比较优劣和短长。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国人呼吁大家要清醒认识一战是人类文明的分水岭, 应乘此机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 不

要汲汲于东西方文明之争。如有一位中国人在1918年《晨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大战即终,十九世纪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纪文明方从兹发展。换言之,即世界由旧时代而移入新时代。”“故我国民果欲为适应时势之国民,第一须求得有方针之教育,第二须其方针无背于世界之新潮,否则惟有自归淘汰而已。此则吾人所应大觉悟者也。”⁸

一战后,在亚洲对西方文明批评最厉害也最有影响的是印度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泰氏在1913年即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亚洲人第一个获此殊荣者,声誉远扬,所发言论自然也较引人注意。泰戈尔在1921年写道,“生活在东方之外的人现在必须承认欧洲已经彻底失去其过去在亚洲的道义上的优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经不再被视为公平的代表和高尚原则的奉行着。它充其量只是个西方种族优越论者和对非西方人的剥削者。”⁹他在战后给法国作家、同样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一封信中写道,“亚洲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对欧洲不再喜爱。”¹⁰对泰戈尔而言,“披着文明外衣的西方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所投下的毒药在战后必将祸及自身”。“所谓的欧洲文明之火炬也许不再是灯塔,而是用来杀人放火的东西。”¹¹

一战不仅是对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并导致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同时也对世界文明地图的重新整合及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战是日本的所谓“天赐良机”。¹²日本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举成为世界强国,在巴黎和会上跻身世界五强之列。但就是大发一战外交和经济横财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战后有许多疑惑之处和很强的失落感。日本固然通过一战一跃成为世界五强之一,但西方列强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种族平等”议案嗤之以鼻,拒绝接受。在种族问题上,日本还是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无法同白人国家平起平坐。此其一。其二,毕竟日本是靠德国军事化模式发迹的,德国在一战中的被打败的结局及一战后流行全球的所谓反军国主义思想让不少日本人怀疑日本是否根本上就选错了立国模式,怀疑自己自明治维新以来奉行的所谓“脱亚入欧”的政策是否真的英明。同样通过一战跻身世界强国的美国对一战的影响和后果也是充满疑虑。美国人在“为民主而战”(the war for democracy)的口号下加入一战战团后,发现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自己所愿。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一度被世人奉为神明和救世主,为全世界带来希望。连以“老虎宰相”著称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只给了人类十诫,但此公却给了我们“十四点”的世界新秩序蓝图。后来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声称威尔逊是世上“头号好人”。¹³甚至连泰戈尔也要写书题赠给他。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雄心万丈,立誓要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并建立国际联盟,为万世开太平。但美国人抛弃了威尔逊及其国际愿景,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甚至不准美国加入威

尔逊一手缔造的国际联盟。

可以说，一战后全球的仁人志士、学者和政客都在疑惑，在思考一战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并讨论其是否意味着西方之衰落、科学之破产，抑或为人类带来新的契机。哲学家杜威曾对一战后之世界寄予极高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记者采访时，杜威表示，我们在为民主而战，因为这场大战争，“世界死了，世界万岁！一个伟大的文明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会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崭新社会和文明。杜威虽然声称他目前并不知道战后新世界究竟怎样，但他显然对战后新世界国际秩序充满憧憬，当然也有不安。¹⁴但杜威在战后对世界新秩序极其失望。连杜威先生也疑惑了，但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先生也加入了对科学及对西方文明持怀疑论者之列呢？杜威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期间来到中国，一待就是两年多。中国是除美国之外杜威所逗留和生活时间最长的国家。他还被认为是中国五四时期风靡一时的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的个人化身。由于杜威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他被蔡元培等人称为“美国的孔子”或“第二个孔子”。¹⁵

一战对中国的意义也特别重大，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中国而言，广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起始于1895年，终结于1919年。这期间的中国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思潮，东方的、西方的，都拿到中国试验；共和政体、民主政体，杜威的哲学、罗素的哲学，各种学派和学者都在中国粉墨登场。这个广义的一战时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像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里所描述的那样：“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似乎拥有一切，我们好像又一无所有。我们会直接进入天堂，我们也可能进入地狱。”¹⁶一代新人开始崭露头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西方文明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在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在1912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新文化运动、新的思潮以及民族主义在中国风起云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已经受够了列强的强权即公理的旧体系。中国人对当时的国际秩序亟欲去之而后快，代之以建立在平等、公正、民族自决之上的新的国际秩序，并力图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国际社会并成为其中平等一员。一战的爆发，不仅对这一现存并对中国人不公的旧秩序带来强烈冲击，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根到底首先是一场西方文明内部极其惨烈的内斗，也为西方文明的未来归宿及发展带来众多的不确定因素。正是在这一中西文明处于极其重要的转折关头之际，中国人力争顺势而起，利用这个机会一展宏图，重建文明，重整国运。

2014—2018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之时期。但是，当年围绕这场大战争进

行的全球讨论，这场有关世界秩序、东西方文明的兴衰、科学及机器的论战，到今天仍在继续，也仍无答案。在 21 世纪的现在，人们仍旧继续在讨论，继续疑惑，观点仍旧莫衷一是。事实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考验，西方文明照旧处于优势，跟一战时期比，科学和机器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甚至更为重要的角色，并为全世界所推崇和追求¹⁷。中国自一战以来无疑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还是一个经济上积贫积弱、政治上一盘散沙、外交上任人宰割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则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国际地位与日俱增。今非昔比，可以说，列强在中国颐指气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五四时期我们的先辈所讨论、所纠结的问题今天仍旧存在。例如当时广为讨论的“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中华文明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中国究竟需要有什么样的国家认同等问题，到今天仍旧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中国国家领导人目前大力推行的实现“中国梦”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计划，同“五四”先辈们所追求的理想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处。100 年过去了，现在，当我们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与影响时，也到了让我们深入思考一战究竟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又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并亟须面对的话题。首先，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重视一战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第二，尽管这场战争发生于 100 年前，它在今天的亚洲烙印仍然明显，特别是当我们试图去理解为何中日关系总是问题重重时，我们尤其会感到一战的深刻影响。第三，一战对于中国的国家发展、外交政策以及民族或国际意识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四，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国家认同和相应的国际地位，理解一战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无疑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或许正确解读一战历史正是解开目前许多难题的钥匙。

201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 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造性地提出“以工代兵”、并因此把自己的命运同所谓的“大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100 周年。在全人类正大张旗鼓地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年遗产，并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 周年之际，也许我们应该把两次世界大战放在一起进行思考，回答下述问题：二战是否是一战的延续？或者，是否因为一战的后遗症，造成了二战的最终爆发？这两次世界大战，哪一场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何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或二战开始的时间及定义，是否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回答？中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又何在？从相当大的意义上，一战的重要性远胜于二战。这不仅因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战百年之际，我们对这场所谓的“大战争”的全球意义仍缺乏真正了解，人们仍在辩论其影响及后果。

我们在检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日关系及两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时，也许应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我们甚至应该把两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体，并进而同中日甲午战争放在一起来透视。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中日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对中日两国的近现代进程才能看得更透彻，得到的认识和理解也会更为深刻。杜甫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也许从中日50年战争的角度来俯视二战，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就可能露出真面目了。

从广阔的国际史视野而言，二战的起源可谓因不同地区而异。对欧洲来说，二战起源于1939年应无问题。但从美国人的角度，二战可以说是被日本人“炸”进来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举把美国人拉进战争。美国人加入二战后，自然成为中国人重要盟友。但对中国人或日本人来说，二战如果从1931年所谓“九一八事变”算起，可能是15年战争；如果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算起，则为8年战争。从中日50年战争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一举奠定了日本的东亚大国地位，并让日本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殖民帝国。因为通过甲午一战，日本攫取台湾并将其变为殖民地，同时也为将朝鲜在1910年正式变为日本殖民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战对中国人的重要性还在于，今天世界不少评论家、学者和政客们讨论到中国时都喜欢用一战作比喻，尤其是当讨论中日关系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4年1月在瑞士的达沃斯论坛上告诉全球举足轻重的听众，目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与德国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竞争类似——暗示中日之间的分歧可能会超越他们密切的贸易关系，而中国则会扮演德国的角色。中国人当然不会喜欢被比作一战中的德国。中国外长王毅于2014年3月“两会”期间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日本“与其拿一战前的德国来做文章，不如以二战后的德国来作榜样”。但与此同时，中国外长在回答一个日本记者关于中日关系恶化的问题时也警告说，中国“在历史和领土这两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¹⁸中日之间的外交紧张情绪似乎已经在全球范围的外交事务中展开，所有人都明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更为糟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局势造成的，因此，中日之间目前的关系可以放入一战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要了解一战对今天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明白中日之间在一战之前及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此外，要了解一战对中国的重要性，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回顾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因为正是这场战争为后来中日两国相继加入一战埋下了伏笔。

要理解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没有比通过一战华工的视野来审视更有说服力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西方文明危在旦夕。在这场决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大战之紧要关头，14万中国农民在中、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作为劳工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来到法国，为英、法的生存，为西方文明的拯救，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一曲壮歌。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虽然这些大多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的主要动机是谋生，但他们用自己的血与汗甚至宝贵的生命，参与拯救西方文明，并通过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中国观，从而进一步为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国际社会，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然而，中外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将这一特殊群体集体遗忘了。西方将他们挤出了历史记忆，中国人也很少知道这一群人，更不用说了解他们的壮丽历程了。标示着东西方文明交流辉煌一幕的这段往事，似乎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在世界史、中国史、世界军事史乃至中外文明交流史中，很少有人提到一战华工。在众多捐躯欧洲的一战华工的墓碑上，大多刻有下列四个成语中的一个：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的确，他们在一战西线战场上或后方，固然“勇往直前”“鞠躬尽瘁”，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虽死犹生”或“流芳百世”，而是被人们所共同遗忘。他们的祖国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一批特殊的农民，更不用说表彰他们的事迹了。世界学术界对一战华工的系统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大致尚付阙如。相关政府对一战华工贡献的承认，更是姗姗来迟。早在1925年，中国北洋政府即要求法国建立一战华工纪念碑，以及为一战华工提供抚恤金和遣散费等，但法国以资金短缺为借口一直未能兑现。¹⁹迟至1998年，法国政府才在巴黎第13区中国城内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书“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20世纪90年代，法国影视导演奥列维·纪顿（d'Olivier Guiton）鉴于法国人民对这一中法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几乎忘却，拍摄了近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一战中的14万中国人》（140,000 Chinois pour la Grande Guerre），向法国人民介绍一战华工及其历史贡献。该片的重要价值在于采访了一些定居法国的华工后代，通过他们的讲述，再现了当年一战华工及其后代融入法国社会的故事。通过这部纪录片，一般法国人才意识到一群中国农民参与创造法国历史的突出贡献。2008年秋，在山东威海市档案局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就在当年许多华工跨出国门远赴法兰西的出发地威海，多国学者济济一堂，探讨一战华工的历史。为配合首届一战华工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威海市档案局还同时举办了一战华工图片展览。²⁰2009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的6集纪录片《华工军团》则第一次把一战华工的生活及事迹推到国